

澳門歷史城區建築遺產 與澳門土生葡人

李長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5年將澳門歷史城區定為世界遺產，使澳門這個僅有數平方公里的小半島成為世人矚目的地方。本文試圖通過一些史實，想要說明當我們在欣賞或者研究這個極具文化特點的小城的時候，不能忘記在此生活了四個多世紀的澳門土生葡人對澳門城區建設的貢獻。

明代印光任記錄澳門時有詩云：

蓮峰來夕照，光散落霞紅。
樓閣歸金界，煙林入錦叢。⁽¹⁾

澳門猶如一顆鑲嵌在中國南海之濱的珍珠，媽閣紫煙和龍環葡韻組成了亞洲一道別緻而亮麗的風景線。中西合璧的特色吸引着世界各地遊客到這裡參觀遊覽。進入20世紀，這個小半島已經今非昔比，陸地向大海延伸，滄海變桑田，往日葡萄牙五形盾帆船穿越的“十字門”在橫琴填海區和路氹新城的夾擊之下已經消失，而澳門土生族群在四十多萬華人的“包圍”之下也似乎漸漸被“涵化”。“蠻煙頓清廓，萬象盡昭蘇”⁽²⁾的景象已成為史料中的記憶。當四方遊客欣賞“大三巴”教堂廢墟殘壁的時候，當人們漫步在歐式廣場和石子路的時候，很少有人會想到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四個半世紀的澳門土生族群，更想不到這個人數不多的族群在澳門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然而，當人們拂去歷史灰塵的時候，就會清晰地看到澳門土生族群形成及其發展的漫長軌跡以及這個被稱為“土生人”的葡亞裔族群對澳門城市建設的貢獻。

2005年7月15日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來說，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南非時間當天上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南非舉行的第29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正式宣佈澳門歷史建築群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並被命名為“澳門歷史城區”。

在四百多年的澳門歷史長河中，華人與澳門土生人在澳門這個彈丸小城之內，合力營造了不同的生活社區。正如葡萄牙歷史學家貢薩洛·梅斯吉戴（Gonçalo Mesquitela）描述的那樣，葡華兩族在澳門和睦相處，如同“中間隔有一堵矮牆的鄰居”。⁽³⁾從西人聚集的南灣到華人喧鬧的內港，這些不同社區，除了展示中葡兩國人民不同的宗教、文化以至生活習俗，更展現了澳門中、西風格迥異的建築藝術特色。這種華葡兩族共同創造的溫馨、淳樸、包容的社區氣息，是澳門最具特色最有價值的地方。

澳門歷史城區是一片以舊城區為核心的歷史街區，主要集中在澳門半島填海前的狹長區域內。其間以廣場和街道相連，從葡人最早登陸的半島西南端媽閣廟前地向東北延伸，包括亞婆井前地、崗頂前地、議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穌會紀念廣場、白鴿巢前地等多個廣場或空地。代表性建築物包括媽閣廟、港務局大樓、鄭家大屋、聖

*李長森，歷史學博士，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老楞佐教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崗頂劇院、何東圖書館、聖奧斯定教堂、民政總署大樓、三街會館（關帝廟）、仁慈堂大樓、大堂（主教座堂）、盧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廟、舊城牆遺址、大砲臺、聖安多尼教堂、東方基金會會址、基督教墳場、東望洋砲臺、東望洋燈塔以及聖母雪地殿聖堂等二十多處歷史建築物。

四個世紀以來，澳門歷史城區不僅見證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過程，而且保存了其原有風貌和建築特色。它在中國境內現存的西式建築物中，是年代最久遠、特點最明顯、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位置最集中的建築群，與區內的中式建築物交錯而立，相互輝映，溫馨自然地融為一體。澳門歷史城區隨處可見的教堂更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和遠東地區傳播的歷史見證和結晶。

澳門的歐陸風情吸引了許多人，這種特點尤其表現在建築物上。然而人們並不知道，由於種種原因，歷史上的澳門並無職業上的建築設計師。澳門現存的不少西式古舊建築物的設計都出自並沒有學過建築專業知識的澳門土生葡人之手，而伯得祿·馬貴斯（Pedro Germano Marques）就是其中之一。

在澳門崗頂聖奧斯定教堂對面有一幢古色古香的歐陸式建築，那就是著名的伯多祿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具有極高的建築藝術價值，俗稱崗頂劇院，又稱馬蛟戲院⁽⁴⁾或崗頂波樓⁽⁵⁾。1860年（清咸豐十年）由澳門土生葡人集資興建，以紀念葡萄牙國王伯多祿五世。劇院建成後成為澳門土生葡人舉行慶典集會及文藝演出的主要場所。另外，由於該劇院具有俱樂部性質，設有台球室及橋牌室供會員消遣，故又稱崗頂波樓。劇場可供戲劇演出或音樂演奏，進入20世紀亦曾用作放映電影，故華人亦稱其為馬蛟戲院或澳門戲院。該劇院為一座西洋古式建築，是澳門唯一的歐式劇院。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幢建於19世紀的美侖美奐的建築物的設計者卻是一名並非建築師的澳門土生葡人伯得祿·馬貴斯。

伯得祿·馬貴斯於1799年誕生於澳門，1874年12月15日去世，終年七十五歲。其祖父多明戈斯·馬貴斯（Domingos Marques）出生於葡萄牙北部馬

托（Mato）鎮，後到澳門定居，於1787年1月12日去世，分別於1776年、1783年和1784年任澳門市政廳理事官。1777年10月29日在澳門大堂區同本地土生女子馬莉婭·吉馬良斯（Maria Francisca dos Anjos Ribeiro Guimarães）結婚。伯得祿·馬貴斯本人則於1841年同澳門土生女子 Maria Francisca de Lemos 結婚。可以說，他是地地道道的澳門土生葡人。

馬貴斯·佩雷拉（A. F. Marques Pereira）在其〈澳門歷史上的紀念性標誌〉一文中曾談到伯得祿五世劇院的建設過程：

直到1857年3月7日，一些戲劇工作者及澳門一些對此感興趣的人一直都渴望在澳門建造一座專門用來表演話劇的合適場所，而且這種願望越來越強烈。⁽⁶⁾

19世紀，一些歐洲的文藝形式，特別是戲劇傳入澳門，不少土生葡人都熱衷此道，然而一直沒有一處合適的演出場所。最初，他們祇是臨時使用一些露天場所，比如下環的一片荒蕪空地，其後被改建成若瑟·波爾塔格雷（S. José de Portalegre）男爵的花園。後來又在聖安東尼教堂（花王堂）前面的廣場和仁慈堂舉行表演，甚至在聖珊澤的一處空地上亦舉行過類似活動。然而，在這些地方演出十分不便，為道具的使用及演員的化妝帶來很大困難，最主要的是不可能達到應有的舞臺藝術效果。當時的許多演出都是滿懷激情開幕，最後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而掃興收場，使愉快的娛樂活動變得索然無味。在這種情況下，1857年3月7日，一些在澳門居住的有身份的土生葡人決定結束這種狀況，建議組成一間公司，以入股的形式籌集資金建設一座劇院，一方面為本地土生葡人文藝愛好者提供戲劇演出及藝術表演的場所，另一方面可通過合約形式有條件地向來澳門演出的專業文藝團體開放。另外，還可以做為一個會議中心或者俱樂部，以便會員及股東能夠在那裡閱讀書籍、遊戲玩樂、交友聊天以及從事其它一些休閒娛樂活動。⁽⁷⁾

出於這個目的，上述有關人士即在這一天組成了一個主要由本地土生葡人參加的股東大會，並且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其中包括若奧·桑托斯（João Damasceno Coelho dos Santos）先生、陸軍上校若奧·費雷拉·門德斯（João Ferreira Mendes）先生、若瑟·費爾南·多古拉爾特（José Bernardo Goularte）先生、若瑟·達豐塞卡（José Maria da Fonseca）先生、弗朗西斯科·奧維因（Francisco Justiniano de Sousa Alvim）先生、伯得祿·馬貴斯先生和若瑟·若阿金·羅德里格斯·費雷拉（José Joaquim Rodrigues Ferreira）先生。

一開始並沒有確定劇院的選址，因為他們最初的想法是在聖拉菲爾醫院⁽⁸⁾內附設一個劇場，但很快就發覺把娛樂場所同醫院弄在一起的想法是不現實的，最初的計劃祇好放棄。三月底，該委員會向政府申請嘉斯欄靠近兵營入口處斜坡的一片土地，但這一申請沒有被批准，而是建議他們使用原天主教道明會修院的地方建劇院。委員會認為這一地方不適合建劇院，於是在4月2日的會議上又向政府申請批給聖奧斯定教堂對面的一幅土地，這一次的申請終於被政府批准了。緊接着，委員會立即在澳門香港兩地籌集資金，開始進行劇院的建設。1858年3月，也就是說從奠基起不到一年的時間，劇院的主體結構便初具規模。劇院迅速建成不能不歸功於以下幾位澳門土生人所做出的辛勤努力，他們是澳門的著名外科醫生安東尼奧·路易斯·佩雷拉·克列斯波（António Luís Pereira Crespo），另外還有伯得祿·馬貴斯先生和弗朗西斯科·奧維因先生。其中發揮作用最大的就是伯得祿·馬貴斯，因為正是他設計了這座充份體現歐陸風格的劇院。⁽⁹⁾

伯得祿·馬貴斯本人既不是建築設計師，亦非工程師，卻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藝術造詣，設計並指導了伯得祿五世劇院的建設。該建築十分罕見地將希臘古典建築風格與葡萄牙的傳統建築風格融匯在一起，令人贊嘆不已。由伯得祿·馬貴斯設計的這幢建築物被取名為“伯多祿五世劇院”，以紀念登基五年的伯多祿五世⁽¹⁰⁾（D. Pedro V）國王。而現在的劇院前壁則是1873年由另一位澳門土生人塞爾

高（Cercal）男爵⁽¹¹⁾設計的，並於1918年由若瑟·弗朗西斯科·施利華（José Francisco da Silva）重建。1961年，香港大學建築系的師生曾專門來澳門研究該幢古建築物，並認真細緻地繪製了該建築物的外形及內部房間的設計。⁽¹²⁾

伯多祿五世劇院位於澳門中區的崗頂前地，俗稱崗頂劇院，與環繞崗頂袖珍小廣場的聖奧斯定教堂、何東圖書館和聖若瑟修院，以及枝繁葉茂的古榕樹組成了風情別異的秀麗景色。劇院建築物長41.5米，寬22米，中式坡狀屋頂的屋脊高12米，屋檐高7.5米。建築物體現了新古典主義風格。在內部設計上，大廳平面作縱向佈局，圓形的觀眾席前後佈置了前廳及舞臺，兩側是可供休息的長廊，長廊上設有樓梯直達二樓觀眾席。樓上觀眾席為月牙形，依靠樓下十根排列成弧形的柱子支撐。

劇院正立面有一個寬15.7米的羅馬圓拱形門廊，門廊頂端是等腰三角形山花，線條簡明俊俏。其下則是四組愛奧尼式倚柱組成的三個拱門，門洞寬約3米，而八條倚柱長約6米。山花及立柱裝飾簡約古樸，突顯建築物的雄偉、挺拔。劇院面向崗頂前地的側立面則表現出不同的風格，其牆面一字排開九個寬2.45米的羅馬圓拱落地大窗，突出了牆面的水平感，氣度渾厚非凡。建築整體以蘋果綠色塗料粉刷，襯托墨綠色門窗及紅色屋頂配，加以周圍黃色為主調的環境，更加顯得崗頂建築群的溫馨和諧。

與澳門土生人有關的建築物並非僅有伯多祿五世劇院，還有澳門的標誌性建築物東望洋燈塔。矗立在澳門松山（東望洋山）上的燈塔的歷史並不久遠，到現在還不足一百五十年。然而，它卻是中國沿海地區海岸線上的第一座西式燈塔。松山燈塔因聳立在松山松濤中而得名。松山原名琴山，又叫東望洋山，是澳門半島最高的山崗，海拔93公尺，構成澳門半島地理座標的標誌點。松山燈塔與另外兩個具有三百年歷史的古蹟松山砲臺和松山教堂構成一處極具誘惑力的旅遊景點。於此遠眺，澳門全景及珠江口的壯麗景色盡收眼底，人們可在此領略“鹹淡水文化”的交融⁽¹³⁾以及澳門的古今變遷。

松山燈塔高13米，九年後的1874年8月被颱風摧毀，至1911年才重建使用迄今。松山炮臺所處位置是澳門的最高點，比燈塔的歷史要早，建於1637-1638年，面積約8,600平方英尺。由於在砲臺上可俯瞰全澳及遠海，因此砲臺的主要作用是防禦外敵及作為觀測站。砲臺上的聖母雪地殿教堂更早於砲臺，建於1626年，所祀奉的是葡國護祐航海的神靈。

東望洋砲臺和聖母雪地殿教堂具有17世紀葡國修院的建築特色。經過1996年的修繕，恢復了聖堂和庭院的原貌。在修繕過程中發現了被覆蓋多年的壁畫，這些壁畫糅合了中西文化的特色，具有極高的觀賞和藝術價值。除了著名的燈塔外，東望洋砲臺還建有數座堡壘和防空洞。防空洞由四組隧道組成，是昔日的軍事禁區，結構堅固，守衛森嚴。四組防空洞中最長者有456公尺，最短的也有47公尺。內有發電機、休息室及貯油池，並設有登上燈塔砲臺的升降機等。

松山燈塔首次啟用時間是1865年9月24日，於澳門總督若瑟·羅德里格斯·戈埃略·阿馬勞(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¹⁴⁾在任期間組織領導建成。但是，人們很少知道，這座用手工機械操作並且以煤油為照明燃料的燈塔設計者是一位名叫卡洛斯·維森特·羅沙(Carlos Vicente da Rocha)的心靈手巧的澳門土生葡人。

燈塔由在澳門經商的外國人馬傑森(H. D. Margesson)出資建造，他在澳門龍嵩街17號設有一家公司。⁽¹⁵⁾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該燈塔的模式由設計者卡洛斯·維森特·羅沙親自送往里斯本，被收藏於葡萄牙海軍部多年，卻在一次火災中被燬壞。

卡洛斯·維森特·羅沙是澳門一個顯赫土生葡人家家庭的後裔，這個家族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澳門生活。他於1810年10月12日出生在澳門，1883年4月21日去世，在維森特·加埃塔諾·羅沙(Vicente Caetano da Rocha)的子女中排行第八。卡洛斯·維森特·羅沙的職業並非建築設計師，而是財政廳司庫，同時還是澳門軍事組織國民步兵營的上尉軍官。1865年5月19日在澳門同土生人洛佩斯(Lopes)

家族的女子若安娜·馬莉婭(D. Joana Maria)結婚。1865年10月2日，澳門港務局長若瑟·愛德華·斯卡尼西亞(José Eduardo Scarnichia)發出了這樣一份通告：

從上個月24日夜晚起，建於本市東望洋山砲臺上的新燈塔開始點燃運作。燈塔位於北緯22°11'及東經113°33'的位置，射燈所處海拔高度為101.5米，在天氣良好情況下可射至遠海。燈塔高度從基礎至頂部為13.5米，為八角形，塔身涂以白色。射燈燈體為紅色，射燈不停旋轉向四周射出白光，旋轉速度為每一周64秒。在氣候條件良好情況下，光柱照射距離可達20海哩。⁽¹⁶⁾

燈塔建成十年後，1874年9月22日，澳門遭遇歷史記錄上最為猛烈的颱風襲擊。正是卡洛斯·維森特·羅沙本人命令鳴槍發出警報，通知澳門居民颱風來臨。燈塔在這次颱風襲擊中遭嚴重損壞，塔身需要重建。燈塔在東望洋山頂照射了百多年，不僅為來往船隻指引航路，而且構成了澳門及其鄰近島嶼最為壯麗的景觀之一。在此期間——

由於長時間的風吹雨淋，歲月侵蝕，舊燈塔於1910年6月29日停止工作，代之以從法國巴黎引進的現代化的自動旋轉式燈光設備，使這一古老的燈塔重放光芒。⁽¹⁷⁾

在這裡須提到另一位澳門土生葡人，他就是長年累月不辭辛苦在山頂上管理看守燈塔的老兵迪奧格(Diogo)。他是一位極普通的土生人，普通到人們已經忘記他的姓氏，祇知道他的名字叫迪奧格。他是一位退伍軍人，保持着軍人服從紀律、忠於職守的優良傳統。他對燈塔管理十分精心，“絕不允許射燈的轉速有絲毫差錯，更不能讓燈塔熄滅。在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下，他日夜守衛著燈塔，保證他的安全。”⁽¹⁸⁾港務局長愛德華·羅倫索(Eduardo Lourenço)於1898年在紀念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航路400週年的專刊《唯獨報》上專門發表文

章，滿懷激情地“贊揚了一位名叫迪奧格的老兵，稱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精心管理並陪伴着這座極具美學特色的燈塔”⁽¹⁹⁾。這座燈塔已成為澳門的標誌，象徵着澳門開埠至今四個多世紀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充滿活力地生存與發展，“就像那座燈塔一樣永遠也不會熄滅”⁽²⁰⁾。

說到設計松山燈塔的澳門土生人卡洛斯·維森特·羅沙，還要提到澳門歷史城區另一所有代表性的建築物，那就是位於澳門中區制高點的主教座堂。正是他同另一位澳門土生人奧索里奧（C. A. Osório）一起主持安裝了主教座堂的大鐘，使全澳居民第一次聽到報時的鐘聲。

主教座堂於1850年重建之後，人們對於新教堂的華麗裝飾及寬暢明亮、美侖美奐的大堂贊嘆不已，莊嚴雄偉的外觀也令人十分滿意。但美中不足的是，沒有一個自動報時的大鐘。當時的西方，在高大建築物上安裝新式的機械大鐘已成為時尚，然而在19世紀中期的中國卻是稀罕之物。澳門主教熱羅姆（Jerónimo）認為，由於主教座堂位於居民區的最高處，應該在教堂安裝一個大鐘，使全澳百姓能夠聽到報時的鐘聲。當時購置一個大鐘需要1,500圓⁽²¹⁾，於是澳門土生居民紛紛捐款，移居香港和廣州的澳門土生人亦慷慨解囊，終於湊齊了需要的款項。⁽²²⁾大鐘在英國訂製，英國的 Thwaites & Ree 公司根據主教座堂的外觀及鐘塔的設計平面圖專門對大鐘進行了設計。大鐘運回澳門後，由奧索里奧和卡洛斯·維森特·羅沙主持安裝。在當時的條件下，將大笨鐘安裝到主教座堂的牆壁上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這兩位聰明的土生人克服各種困難，想出許多辦法，終於在1857年底把大鐘安裝到主教座堂的鐘塔上，使全澳居民在1858年新年的第一天首次聽到西方才有的機械大鐘的報時聲。

在澳門，人們都會被前澳督府優雅的建築風格所吸引，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幢建築物的設計者是澳門土生葡人若瑟·托馬斯·阿奎諾（José Agostinho Tomás de Aquino）。若瑟·托馬斯·阿奎諾是在澳定居的第三代澳門土生葡人，1804年8月27日生於澳門風順堂區，1852年6月21日歿

於風順堂區。他在聖若瑟修院的學校學習，1818年赴葡國里斯本葡英學校學習數學、設計及商業等科目，於1825年返回澳門後獲里斯本商業資格裁判所（Tribunal do Comércio）頒發的資格證書。⁽²³⁾他是澳門若干重要建築物的設計者，如位於南灣的塞爾高（Cercal）男爵宅第（即現總督府），若瑟·維森特·喬治（José Vicente Jorge）的宅第（現已拆除），十六柱（即龍鬆街的一幢大型建築物，現已拆除建成慈幼學校），以及重建聖老楞佐教堂和主教座堂等等。

前澳督府包括一幢二層的建築物及一個很大的花園。整座建築物坐落在海旁斜坡的花木之中，其造型頗具特色：全樓層以白色邊為界、上面有寬深的陽臺、突出的山形窗棧和白色法式百葉窗以及平臺式屋頂。建築物以花崗岩石料為牆基，結構牢固，左右兩翼伸出，拱形窗門，鑲嵌木質百葉窗。花園分佈在建築物的後面及右側，極富歐陸情調。澳督府是澳門又一個具有特色的建築物，位於充滿亞熱帶風情的南灣湖畔，而昔日這裡則碧波盪漾的海灣。該座異國情調的宮殿紅牆白窗、石基陽臺、拱門回廊，顯得十分雍容華貴。現在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辦公室。

澳督府建於1849年，其設計人就是澳門土生葡人若瑟·托馬斯·阿奎諾。他雖不是職業建築師，但身兼多職，投身多種行業，而且酷愛藝術，特別是建築藝術。他本身是房產主，但亦為澳門臨時步兵營的陸軍中尉和“馬格利特”號運輸船的船長。還曾任市政廳商務監理（1840）、市政委員（1841）及市政廳預審員（1842）和里斯本美術協會會員（1839）。1831年6月7日在風順堂區同澳門土生羅沙家族的羅莎·馬莉亞·羅沙（Rosa Maria da Rocha）結婚。⁽²⁴⁾

若瑟·托馬斯·阿奎諾還於1844-1846年主持了風順堂區聖老楞佐教堂的重建工作；同時期還主持了龍鬆街十六柱（現慈幼學校）的重建工作；1845-1850年，主持了主教座堂的重建工作，重建工作於1850年2月19日完成。在該教堂西南側的外牆的石壁上，仍可見到這樣的銘文：Erecta/A. D.

MDCCCXLIV/J. T. de Aquino del.，意思是：“公元1844年始建，由J. T. 阿奎諾設計。”⁽²⁵⁾

說到澳門歷史城區的建築物，還要提到澳門土生人塞爾高男爵。他不是職業建築師，但作為曾在法國和意大利學習過繪畫藝術的工程師，他不僅擔任過工務局長，還參與了許多建築物的設計工作，包括今天成為著名景點的聖珊澤宮（原澳督官邸）、澳督府（現特區政府總部）、舊西洋墳場以及港務局大樓（原摩羅兵營）。他還主持修建了曾被人譽為西洋建築精品的舊山頂醫院（已被拆毀）以及伯多祿五世劇院的翻修工作。

澳門歷史城區見證了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同時也證明了中國文化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及其對異族文化的開放與包容。難能可貴的是，雖然澳門正處於現代經濟的巨大發展與變化之中，但其歷史城區至今天依然保存着原有的面貌，繼續散發着其原始古樸的魅力。澳門歷史城區不僅是澳門文化和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澳門為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留存的一份珍貴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中國第三十一處世界遺產，是世界對中華文化，也是對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匯成果的肯定。它將使澳門市民更加留意和關心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產，瞭解澳門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認識自身獨特的文化價值。同時，我們亦不能忘記澳門土生族群在澳門歷史城區建築群形成及保留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註】

- (1)(2) 印光任、張汝霖著《澳門記略》，頁2。
- (3) Gonalo Mesquitela, *Hist3ria de Macau*, Volume I, Tomo II, ICM, pp. 15-18.
- (4) 馬蛟為葡文“Macau”一詞的粵語音譯，指澳門。
- (5) 粵語稱“球”為“波”，音譯自英語“ball”。
- (6) 據 A. F. Marques Pereira 著 *Efem3rides Comemorativas da Hist3ria de Macau*, 載文德泉神父著 *Topon3mia de Macau*, ICM, Vol. I, pp. 322-323.
- (7) 澳門著名的巴黎艷舞團在現葡京酒店的演出場地建成之前，曾有相當一段時間裡在伯多祿五世劇院進行表演。

- (8) 位於澳門白馬行，耶穌會早期建的慈善醫院，華人稱之為“醫人廟”，亦有人稱“白馬行醫院”。澳門回歸前為政府貨幣監理署所在地，現為葡萄牙駐澳門領事館，二樓為東方葡萄牙學會會址。
- (9) 前揭文德泉神父著 *Topon3mia de Macau*, Vol. I, Ibidem.
- (10) 葡萄牙第三十任國王，馬麗亞二世女王之子，1853年登基。
- (11) 塞爾高男爵（Bar3o do Cercal）原名 Ant3nio Alexandrino de Melo，第四代澳門土生人，澳門富商，擁有五艘輪船的船東，從事海上運輸事業。1837年6月7日生於澳門風順堂區，1885年5月27日去世。早年在法國及意大利學習繪畫及設計，精通法語、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並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1863年9月16日被國王授予男爵封號。
- (12) 前揭文德泉神父著 *Topon3mia de Macau*, Vol. I, Ibidem.
- (13) 在香港和澳門之間的珠江入海口有一道明顯的分界線，晴天站在東望洋山居高臨下，該條分界線清晰可見。該線以東水色湛藍，該線以西水色渾黃。有學者認為湛藍的鹹水代表西方海洋文化，而渾黃的淡水代表中華陸地文化。江水泄入海洋，相互融匯，如同中西文化的交融，因此有人稱澳門的文化為鹹淡水文化。
- (14) 第八十五任澳門總督，1863年6月22日到任。並非被華人義士沈阿米刺殺的第七十九任總督亞馬勒（又譯阿馬留），但兩人同姓。
- (15) 前揭文德泉神父著 *Topon3mia de Macau*, Vol. I, p. 378.
- (16)(17) 前揭文德泉神父著 *Topon3mia de Macau*, Vol. I, pp. 378-379.
- (18)(19) 見 *Jornal 3nico - Celebra3o do 43 Centen3rio do Descobrimento do Caminho Mar3timo para a 3ndia por Vasco da Gama*, fac-s3mile da ed. de 1898, Governo de Macau / Livros do Oriente. 1998年5月。
- (20) 前揭文德泉神父著，*Topon3mia de Macau*, Vol. I, 1997, pp. 379-380.
- (21) 相當於當時葡萄牙貨幣1,500,000列依。
- (22) 據文德泉神父研究統計，本澳土生人捐資400多圓，移居香港的澳門土生人捐資223圓，移居廣州的澳門土生人數最少，但他們捐獻了800圓。
- (23) 文德泉神父在《澳門土生精英錄》第640/644頁中收錄了 Francisco Ant3nio de Aquino 一份有趣的自傳，講述了其赴葡國及進入葡英學校學習的情況。
- (24) 參閱 Jorge Forjaz, 著 *Fam3lias Macaenses*, Vol. III, ROCHA 家族, § 13, N.3 III.
- (25) 前揭文德泉神父著，*Topon3mia de Macau*, Vol. I, 1997, pp. 107.